



电视剧《伪装者》在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分析

张聪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伪装者》作为一部抗日谍战剧,以其独特性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观感。整部剧以明家为主要叙述环境,涉及人物众多,并赋予多重伪装身份,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爱国战争戏。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他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为分析《伪装者》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角色模式分析其爱国的表层意义,以语义矩阵模式挖掘深层的人性。另外,这部剧又映衬出对90后的认同感、电视剧转型的背后是国民心态、兴趣点的转型等多重现代化意义。

关键词: 格雷马斯;角色模式;语义矩阵;人性;现代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J9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12-0124-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28

Analysis of the TV Series "The Pretender" under the Structure of Perspective

ZHANG Cong-mi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Pretender" is an anti-Japanese war spy drama, and it brought to mankind visual perception with its unique. The main narrative environment of the whole drama is the Ming family, in which involving many people and they were given multiple fake identities. The drama presented a fierce patriotic war drama. Greimas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tructuralism Narrative, whose role and semantic analys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nalysis "The Pretender".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ole models analyzes their patriotic surface meaning and semantic matrix pattern. In addition, the show has reflected a sense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90's. The drama is the national mentality transformation, transition points of interest, such as multiple modernizatio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reimas; role model; semantic matrix; human nature; the meaning of modernization

结构主义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上产生的,它主张从事物的整体上,以及整体中诸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把握事物。而作品内部存在一种普遍性结构,所以结构主义为作品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角。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为两个层面,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所谓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即角色模式,角色两两之间构成二元对立关系。而对于深层结构的研究,格雷马斯引入“语义矩阵”理论,通过不是对立就是否定的行动素来说明

叙述的普遍模式和语法本质,应用语义矩阵对文本分解然后组合的过程中,文本意义得以建立。本文将通过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理论对影视剧《伪装者》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理解影片的深层含义。而抗日谍战剧《伪装者》改编自张勇的小说《谍战上海滩》,以抗日战争中汪伪政权成立时期为背景,讲述了抗战时期上海滩隐秘战线上国、共、日、伪四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较量。以上海明氏家族四姐弟的视角,诠释了抗战隐蔽战线上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书写了一场场精彩暗战,更彰显出大时

代、大家庭以及小人物之间的艺术张力。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作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新的视角审视剧中的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功能关系,并能深入作品结构,探索其深层内涵。

一、角色模式建构爱国信仰

格雷马斯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普洛普有关民间故事的“叙述结构”理论,提出三种“行动素范畴”,即所有的行动都可以适合的三组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并产生故事中的六种角色:主体/客体;遣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这三组对立模式描述了所有叙事中的三个根本模式:(主体/客体)追寻欲望或目的;(遣送者/接受者)交流互通;(帮助者/反对者)对主体的支持或阻碍。格雷马斯认为,所有叙述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在故事中都发挥着某种特定功能,作品意义也得以产生。结合格雷马斯角色模式来分析《伪装者》,可以发现剧中最基本的叙事结构和表层含义。

《伪装者》是以国、共、日、伪四方为中国的存亡命运作出争斗为剧情主线,为了共同的爱国信仰,国共两党走到一起,与汪伪政府、日军奋力搏杀,为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曙光。但是整部剧并不是以宏大的战斗场面、敌我双方力量的殊异,也不是靠无尽的眼泪与磨难牺牲作为抗战胜利的砝码,而是以四位核心人物即明家四姐弟被赋以双重或多重的伪装身份,进行间谍式伪装作战,以一个大家庭中小人物的命运反观整个国家的兴衰变换,使剧情扑朔迷离,惊心动魄。从各大对立阵营来看,民国时期日军侵略与汪伪傀儡政府叛国使得家国离乱,人民即接受者承受不安之苦,这种处境即遣送者就驱使富有战斗力和领袖力量的共产党来背负重任。共产党作为追寻爱国和救国的信仰,并为此进行智力较量,共产党显然是主体,客体就是爱国信仰和救国这一终极目的。但是,在主体追寻客体的道路上并不是平坦顺利,反对者会成为主体追求远大理想的障碍者,日军和汪伪政府就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最大反对者,使得革命步履维艰。在整个中国被日军无尽欺凌的境遇下,国民党成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帮助者,为战争取得胜利增添筹码。而从剧中的角色关系来看,则显得更加复杂。四位核心人物明镜、明楼、明台和明诚最根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肩负救国的历史重任,是主体。另外黎叔和程锦云也是共产党,是作为帮助者出现,明台的军统特训老师王天风、生死搭档于曼丽,还有军校副官郭骑云身份为国民党,也是明氏姐弟的得力帮手。而在汪伪政府任职的76号特工情报处处长汪曼春和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则为阻碍者,日本特高课更是百般阻挠。

二、语义矩阵彰显人性内涵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为基础^{[1]71},格雷马斯提出语义矩阵理论。格雷马斯认为,在叙事文本的所有功能项中,暗含着许多在逻辑上是正反关系的结构,“符号矩阵是一种逻辑,把结构的可能性用图形建构出来,并且这种功能分析把叙述事件与意义的结构元素联系起来;它创建了从过程到系统的一条通道”^{[2]165}。在语义矩阵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对立,即X与其对立面反X,与X矛盾但不对立的是非X,与反X矛盾但不对立的则是非反X,正是依据这四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文本的深层意义才得以衍生。

电视剧《伪装者》深层内涵的显现建构,需要把各大叙事元素安放到对应的结构中。此剧宏观的故事线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与日军、汪伪政府作战,以求得国家的生存;而微观的故事线索是在明氏家族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姐弟四人都在隐瞒亲人的情形下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爱国救亡的道路,但都是以间谍或伪装身份进行作战行动,就这样在战场与家庭之间不断地伪装穿梭变换。革命的道路艰辛漫长,荆棘连连,在更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无尽牺牲,这是国难当前的大义之举,但也暗示家庭亲情的逐渐疏离,亲人每天单纯上演似乎并无政治事业的脉脉情感,深刻地透露出四人周旋于国家与家庭两难全的内心苦痛与挣扎。宏观线索表现的是具有可替代性的表层含义——救国之于危难,而宏观线索若按照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进行分析,则表现出不可重复的深层内涵。

在第二条叙事主线中,处于深层的叙事元素X可以设定为人性饱满,即人物角色对国家情愫、个人亲情以及爱情三者的最好情感抉择,反X则为人性幻灭或无人性,非X可以理解为人性缺失,最后非反X代表人性转变,即在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下,人性得到回归。就此,剧中的人物、事件等可以分为四部分,并根据语义矩阵解读各类人物之间的关系:明氏姐妹中明镜、明楼、明诚,共产党员黎叔、程锦云,以及军统特工王天风、郭骑云,这几组人物代表人性饱满X。明镜在家庭中扮演长姐如母的角色,严厉地爱着亲弟弟明楼,又出于感恩和同情心,收养了两位弟弟明台、明诚,散发无尽关怀爱意,是大家长的代表,温柔沐浴人人,却又人人畏惧;在公司又是明氏集团董事长,精明能干,身担重任;故事中一个非常大的悬念是她的真实身份为红色资本家,为抗日前线运送关键物资。大哥明楼深深爱护两个弟弟,数次营救陷入险境的明台,与明诚更是互不相离,配合默契;明楼的显性身份是汪伪政府经济

司财务顾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显现一副“汉奸”模样,而隐性身份是军统情报科上校科长,代号“毒蛇”,一直到故事结尾处才透露他是最为神秘的伪装者——中国共产党情报组组长,代号“眼镜蛇”,他在这四重身份之间不断周旋,并以新政府官员的身份为军统和中共顺利执行任务出谋划策,智勇双全。在大义与爱情中毅然选择了前者,因为于他而言,汪曼春虽为初恋,但更能嗅出冷血杀手的无情味道。明诚靠明镜姐弟接济长大,与其说身为仆人,不如说是明楼的得力助手,他拥有军统和共产党双重角色。黎叔在儿子年少时就暂先舍掉亲情而投向党、踏上红色事业的征程,身为共产党行动组组长,而就在这漫漫征途中,他不间断地搜集旧报纸等信息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明台,父爱终于由缺失走向回归。程锦云温柔贤淑,是共产党行动组成员,在执行任务中与明台多次合作,产生爱情,并指引明台成为共产党。军统中王天风是情报科上校科长,代号“毒蜂”,与明楼爱恨参半,惺惺相惜,他是可谓的霸道专横者,骗取逼迫明台前往湖南军校特训,使明台熟练掌握特工技能,但是在“死间计划”行动中,却有着无限牺牲和自我毁灭的精神。郭骑云是王天风的学生,是A组组员即明台的下级,忠诚于老师,倾心单纯爱情。这些角色在黑白间游走,形象饱满,人性凸显。反X即人性幻灭的代表是日本特高课和汪伪政府,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中国人民,杀害地下党,进行惨绝人寰的暗杀活动。汪曼春、桂姨相当于非X,即人性缺失。汪曼春冷艳高傲,钟情明楼,也因为冷血毒辣,滥杀无辜,残害抗日分子,叛国投敌而葬送了自己的爱情,最终以性命来偿还她所犯下的错误。桂姨是明家之前的佣人,明诚的养母,被明家赶走后被南田课长所救,之后以“孤狼”身份奉命潜伏在明家监视明家姐弟的行动,身份在行动中暴露并葬送了性命。汪曼春和桂姨可以称之为国家的蛀虫,人性和爱国信仰的缺失是生命的终结因素。最后,明台、于曼丽和梁仲春可以看做是非反X,即人性转变。明台是明氏家族小公子,风流倜傥,饱读诗书,身手不凡,在优越环境中带有痞气、轻佻,又不成熟。以在飞机上救王天风的性命为转折进军校特训,从小少爷转变成合格特工。他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然而本已复杂的身份背后,他又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黎叔遗失多年的孩子,时而狡黠如狐敏捷似剑,时而干净如水温暖似光,纵然身份重重、伪装多变,一颗爱国救国之心从未动摇。经历从青涩冲动到沉稳机谋,从血性少年终成爱国义士的成长转变。于曼丽早期身世凄惨,为了复仇做了女修罗,完成复仇落入王天风之手,由于她坚毅独特,王天风对她进行掌控和利用,成为冷冰冰的杀人武器。过

去的经历让她以僵硬无生气的状态生活在军校,直到明台的出现,让她动了爱情的念头,给她生存下去的理由和信念,二人成为生死搭档,最终成为一名爱国战士。梁仲春是汪伪政府行动处处长,与汪曼春的工作具有相同的性质,搜杀抗日爱国人士,并且在国家危机时刻发国难财,进行走私,贪慕权力,由于明诚帮他家人解决危难,梁仲春最后知悔改,保卫明家兄弟,内在人性被唤醒。

就此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6种对立关系:(1)人性饱满X与人性幻灭反X:明家姐弟、共产党黎叔、军统王天风等人在家国离乱的背景下,仍表现出爱国情、亲情、师生情以及爱情的鲜活人性,这与日军、汪伪政府对人性的毁灭形成尖锐的对立;(2)人性幻灭反X与人性缺失非X:日军汪伪惨无人性,令人发指,而汪曼春、桂姨作为中国人却背叛家国,缺乏人性,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3)人性缺失非X与人性转变非反X:汪曼春和桂姨从生存到毁灭,始终未走向正义的信仰,而明台、于曼丽,甚至梁仲春由于某人的出现或某事的发生而发生转变,对生活充满热情,共赴家国;(4)人性转变非反X与人性饱满X:明台、曼丽以及梁仲春的幼稚与明家姐弟、黎叔等人的稳重成熟形成对立;(5)人性饱满X与人性缺失非X:明楼本对汪曼春有情,明家姐弟也出于对桂姨的同情,让她成为明家的佣人,但是二位却被利益等迷失方向,终无回头;(6)人性幻灭反X与人性转变非反X:日军和汪伪政府惨无人道,毁灭人性,而中途人性转折的三者呈现出对人性的复归。这六种对立关系交织成复杂的冲突结构,这一结构表明:人性饱满鲜活,富有人情味,才能趋向正义信仰,获得真正的生存价值;也表现出主人公不甘于沉沦政治道路而远离亲情的内心挣扎与艰难人性抉择,而人性缺失必然遭到毁灭。

三、《伪装者》背后的现代化意义

在结构分析的过程中,也凸显另外几个深层内涵。女性形象和命运也是《伪装者》所要呈现的叙事系列。作为人性饱满X中的女性代表明镜和程锦云在乱世中或温柔或贤惠,衬托出人性缺失非X的汪曼春与人性转变非反X的代表于曼丽的大胆任性、疯狂搏命。明镜是有爱的大姐,掌握明氏集团,又以资金支持抗日行动,是一副鲜活的成功女性和巾帼形象,无奈结尾陷入死亡圈套。程锦云是一名共产党,与明台多次合作执行抗日任务,并成为一对“生死恋人”,表面上看程锦云的出现是为了剧情的设置,加入感情线,但是最深层的含义是给明台提供接触共产党的渠道,为他入党做铺垫,是向党组织靠拢意识的反映,也是展示国共合作,并没有表现国共

矛盾上的冲突,重新塑造人们对民国的认识,是迎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契机。汪曼春的叛国行径葬送了她倾慕已久的爱情,也葬送了美丽生命。黑寡妇于曼丽曾经凄惨痛心的雏妓复仇经历,则是旧时代底层苦命妇女缩影。汪曼春和于曼丽都是单相思,同样卿本佳人,最后香消玉殒,让人叹息。

作家周国平有句话写道“偏才或有强的感情,或有强的理智,或有强的意志。全才三者俱强,因而要忍受最强烈的内部冲突,但也因此有最深刻的体验和最高的成就。最强的本能受到最深的潜抑,从而有最耀眼的升华。”^[3]¹⁶⁶ 可谓是明台本人的真实写照。明台从不掩饰真性情,没有刻意压制其本性,仍是玩世不恭、心直口快、任性妄为的小少爷形象,同时优越的家境造就富家少爷应有的修养和风度,再经过军校的磨练,展现出他的理智和意志,从放荡不羁走向睿智成熟。这让大量的观众对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少爷能否担负救国重任产生质疑,就此我们发现其背后的缘由。由于时代更迭,社会发展,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处于21世纪的90后青年有着与70、80年代不一样的气质特点,给人一种个性张扬、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烈、过分自我的消极印象,被认为是精神匮乏的一代人,90后青少年被湮灭在这种负面的现代心理当中。正是此剧的播出,明台从狂傲放荡到信仰回归、坚毅睿智的转变,让人们对90后又产生了认同感,而明台也正是90后青少年的影子,是在建构青少年自身的话语,所以必然受到大多观众的青睐。

《伪装者》自湖南卫视开播以来,吸引了大量观众,尤其是90后青年一代。从浅层而论,一是因为湖南卫视这一播放平台的品牌综合影响力,湖南卫视以精准定位和个性表达为理念,彰显“年轻、快乐”的主题,受到以青少年为核心群体的追捧和喜爱;二是导演、制作团队的力量,使抗战题材剧趋向于偶像化潮流。表演明星阵容的年轻化、高颜值;极尽时尚风情的妆容、服饰,男特工的风衣、西装、马甲,女特工的制服、旗袍;强剧情、快节奏,制造出现代化的视觉特效技术,剧中“蛇蝎出巢”、“粉碎樱花号”、“丧钟敲响”、“越轨计划”等核心任务,以及“刺杀汪芙蕻”、“血洗咖啡厅”等小任务,多是爆破、枪击等动作场面,十分利于展现直观的对抗与冲突,带来了非凡、刺激的视觉效果,产生焕然一新的观感。这样的人物设置和情节描写,很明显具有清新利落又奇情美欲的偶像剧风格。也体现出此剧与以往抗日剧不同的是国难和家难交织,通过一个上海滩金融之家,一个大姐和三个特工弟弟,这样更能以小见大,深刻反映革命时代的腥风血雨与艰难重重,以浓厚的笔墨着重刻画几位特定人物。这种剧情设定以人物为

桥梁,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架构,因此更容易让观众接受那段并未亲身经历过的残酷战争,也能感受抗战者内心的坚定信念和心路历程。《伪装者》也有别于以往抗战剧的大胜利和大团圆结局,而是继续深化明家四姐弟在战争环境中的悲情命运。在剧情结尾,火车站的营救行动遭遇失败,大姐明镜为了保护三兄弟而死于藤田方正枪下,令人无限悲恸,明楼三兄弟继续潜伏,以完成新的任务。一家人,在黎明前的黑夜,背负使命,继续奋斗。究其深层,在当代中国的新媒体语境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传媒产业化的趋势走向甚至是国民心态、兴趣点的调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传媒的“话语”。但正是这种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以视觉形式呈现形象的现象繁增,强度也越来越大,制造视觉奇观已成为新媒体吸引受众的不二法宝。另外,高度发达的媒体和网络表面上夸大了人的交际圈,然而现实却使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疏远,也使私人空间变得日益狭小。媒体的暴力让人类失去了主体性,在更加狭小的空间里,成为被动接受的存在,这难免令人担忧。

四、结语

在大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是战争机器碾压下的牺牲品,越是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和使命,就越是难以脱离,《伪装者》的三兄弟也是如此,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们就必须以“伪装者”的身份继续披肝沥胆,以命相搏。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一代人的使命。所以,《伪装者》有着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抗日精神诠释的含义。从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分析可得出深层内涵,人性的鲜活,使得主人公在伪装身份的转变中体现出复杂的内心世界,伪装的艰辛、小心翼翼与狡黠睿智并存;女性命运的大揭示和地位提高,以及对现代心理、意识形态的反映;看到媒体时代的暴力式侵袭,还有现代影视剧和观众向偶像青春抗日剧类型的转变。通过封闭式结构分析,透过表层挖掘出其最深层的意义。相信新时代下的谍战剧会有更加新颖的解读和现实意义。在泛娱乐的大背景下,《伪装者》走在新时代的前列。

[参考文献]

- [1] 王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 A. J. 格雷马斯. 论意义[M]. 冯学俊, 吴泓缈,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 [3] 周国平. 人与永恒[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学术编辑 胡世强]

[责任编辑 李兆平]